

碑銘所見
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

馬長壽著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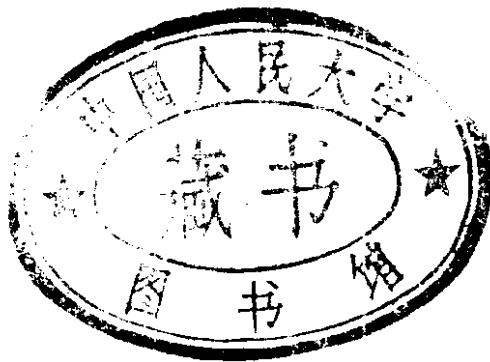
11.311/35
1230052



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

馬長壽著

2031/23



中華書局

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

馬長壽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3³/₄。印張·1插頁·79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0,000冊

統一書號：11018·515 定價：0.70元

目 錄

一	序言	1
二	前秦《鄧太尉祠碑》和《廣武將軍□產碑》所 記的關中部族	12
三	北朝前期的李潤羌和北魏造像題名的四種 方式	39
四	北朝後期鮮卑雜胡入關後的聚居和散居.....	52
五	渭河以北各州縣的羌民和他們的漢化過程 ...	69
附錄一 關中北魏北周隋初未著錄的羌村十種造像		
	碑銘.....	89
(一)	《夫蒙文慶造像銘》北魏神龜二年.....	89
(二)	《雷漢王等造像記》(殘)北魏永安二年	90
(三)	《雷樹等五十人造像銘》北魏無年月	90
(四)	《邑主僕蒙□娥合邑子卅一人等造像記》 北魏永熙二年	91
(五)	《雷文伯造像銘》北周保定元年	92
(六)	《邑主同瑀龍歡合邑子一百人等造像記》 北周保定二年	93
(七)	《雷明香爲亡夫同瑀乾熾造像記》北周天和六年	94
(八)	《郭羌四面造像銘》北周無年月.....	95

- (九)《邑主雷惠祖合邑子弥姐顯明等造像記》隋開皇二年 …96
- (十)《邑主弥姐後德合邑子卅人等造像記》隋開皇六年 ……97
- 附唐乾封元年《鬲荀子等廿五人改造佛像題名》……98
- 附錄二 關於關中羌村羌姓的札記 ……………100
- 校後補記 ……………110

一 序 言

古代史志敘述關中部族者，以《史記·匈奴傳》、《後漢書·西羌傳》爲最早，其次是《晉書·北狄傳》和《江統傳》內的《徙戎論》。此外，在各史的四裔傳、列傳、地理志及若干類書、叢書內也可找到一些資料。但上述諸文獻都很散漫，求其能分區敘述、系統闡明關中古部族的專著是少見的。1963年寒假時，嘗以翻閱關中金石志爲事，每有所得，輒抄入日記簿上。所得略多，遂立意寫一論文，從碑銘推測關中部族的分佈和關係。然此意屢起屢仆。以爲自歐陽修以來，企圖以碑銘證史補史者何止數百十家，他們的地位條件雖較優越，所做工作則大抵費力多而成功少。而我於金石素無根基，又無力搜羅關中各縣的碑碣和造像題名，若效顰古人，豈不貽笑大方？因此，有一段時間頗爲銷沈。春節前偶到省博物館開會，武館長伯綸謂從渭南縣渭河北岸白居易故鄉運來北周武成二年造像題名一幢，題名中有白氏，未知與白居易有無關係。嗣後送來拓片四幅，其中羅列北鎮鮮卑雜胡姓氏數十種，殊形瑰異，得未曾有，讀後精神爲之一振。五月間往省圖書館碑帖檔案室參觀，借出舊藏關中羌村造像題名二十多種，十之八九皆爲前人所未著錄。在解放前，陝西省的碑碣造像一度歸圖書館管理，從各縣搜拓而來的碑銘拓本亦羅置其中。後來省博物館成立，碑碣造像皆移交博物館陳列，碑銘拓本則分別度藏於二館之內，造像題名一項在圖書館內所度藏者更多。碑銘之物，古人以去古未遠，應較今人所見既多且確。但上述二館所藏的碑銘，不特爲從前的外省人所不知，即渭南

武樹善在修《陝西金石志》時(公元1935年)亦未曾寓目。我於不經意中得之,不禁狂喜移日,以為自解放以來,一切文物都隨從革命事業而獲得解放,今人所見又何曾多遜於古人呢!因不揣淺陋,草成《前秦至隋初關中部族的分佈和關係》一文,希望從題名的姓氏、官爵、里居和親屬關係,略以闡明關中古部族的名類淵源、地域分佈、姓氏變遷、婚姻關係、階級分化、部族融合以及其它關於北朝官制和地理沿革等問題。因為作者的水平限制,碑銘中有些問題或者看不出來,或者闡述錯了,都在所難免,希望專家同志們不吝賜教,給以糾正。同時,更希望各省市縣的文物機構,注意收集碑銘資料,供給學術界的同志們,使他們利用這些資料,對各地方史和民族史作出新的貢獻。

這篇論文所根據的主要碑銘為下列的二十五種:

一、前秦建元三年(公元367年)《鄧太尉祠碑》

碑今在蒲城縣城東北七十里之東河川,即洛水的西岸。碑原在蔡鄧鎮東南二十里之鄧公(鄧艾)祠內。祠側有鄧公墓,係衣冠塚。1927年宋哲元擬運此碑至西安,先移往東河川,後因事未果,遂擱置於此。碑文在陸耀澍的《金石續編》卷1、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卷10、毛鳳枝的《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9都有著錄。

二、前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廣武將軍□產碑》亦名《立界山石祠碑》

碑在白水縣城東北三十里之縱目鎮。碑文載入王昶的《金石萃編》卷25,但缺少碑額題字和兩側題名。

三、北魏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大代宕昌公暉福寺碑》

碑原在澄城縣北北寺村附近,1918年移置城內南門街初級中學內。碑文在武樹善的《陝西金石志》卷6、毛鳳枝的《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1都有著錄。

四、北魏神龜二年(公元 519 年)《夫蒙文慶造像銘》

碑在耀州。前人皆未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五、北魏永安二年(公元 529 年)《雷漢王等造像記》

碑在耀州。前人皆未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六、北魏永熙二年(公元 533 年)《邑主僕蒙□娥合邑子卅一人等造像記》

碑在今銅川市黃堡鎮。前人皆未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七、北魏《雷樹等五十人造像銘》

碑在耀州。碑文無年月日,按像主之官銜和碑文字體,當爲北魏時的造像題銘。此碑未見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八、北魏《邑子羅暉造像題名》(殘)

碑在藍田縣。碑文無年月日,字體屬北魏。碑文在《關中金石文字新編》卷 1 中著錄。

九、西魏《焦延昌造像碑》

碑疑在富平縣。碑文無年月日,據王昶考釋當在西魏,載入《金石萃編》卷 32。

一〇、西魏大統十年(公元 544 年)《邑子廿七人造像記》亦名《僧習等合邑子廿七人造定光佛寺記》

碑原在舊咸寧縣南關(在今西安市東城)社祭台村石佛寺(唐代名青龍寺)內。碑文載入《金石續編》卷 2 及《咸寧縣志》。

一一、北周武成二年(公元 560 年)二月《王妙暉等造像記》亦名《王妙暉等五十人造像銘》

碑在咸陽縣渭河南岸。碑文載入《金石萃編》卷 36。

一二、北周武成二年(公元 560 年)九月同州延壽郡下邽縣

《合方邑子百數十人造像記》

碑原在渭南縣渭河北岸信義鎮西二里之泰莊村，今已移藏陝西省博物館。此碑未見著錄，拓本今存陝西省文物保管委員會。

一三、北周保定元年(公元 561 年)《雷文伯造像銘》

碑在耀州。此碑未見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一四、北周保定二年(公元 562 年)《邑主同瑋龍歡合邑子一百人造像記》

碑在耀州。此碑未見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一五、北周保定四年(公元 564 年)《聖母寺四面造像碑(銘)》

碑在蒲城縣。碑文載入《金石萃編》卷 36。

一六、北周保定四年(公元 564 年)《同瑋氏造像記》

孫星衍等《寰宇訪碑錄》謂在長安，不確。按其姓氏當在銅川縣或渭北的其它縣內。碑文載入《金石萃編》卷 36。

一七、北周天和元年(公元 566 年)《昨和拔祖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記》，亦名《邑子一百二十八人造像記》。

碑在蒲城縣北的堯山鄉。碑文在《八瓊室金石補正》卷 32，《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 1 都曾著錄。

一八、北周天和五年(公元 570 年)《宇文達造像記》

碑在咸寧縣，今西安市東郊。碑文載入《金石萃編》卷 37。

一九、北周天和六年(公元 571 年)《雷明香爲亡夫同瑋乾熾造像記》

碑所在地不明。從題名中的建忠郡大學生雷鴻遠和宜州大學生雷海傍言之，當在渭北三原縣或耀州一帶。此碑未見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二〇、北周建德元年(公元 572 年)《邑子覺仲茂八十人等造像記》

碑當在銅川、白水二縣間，詳細地點難考。碑文載入《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 1。

二一、北周《郭羗造像記》(殘)

碑在耀州。按郭羗的官秩爲宜州從事，宜州的州治在華原縣，卽今之耀州，爲西魏廢帝三年（公元 554 年）所置，此碑當屬北周。此碑未見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二二、北周《荔非明達四面造像題名》

碑所在地不詳，或云在華州。造像亦無年月，唯題名中有“越公府行參軍”，越公府卽越國公府，乃北周封爵，此碑疑是北周造。此碑未見著錄，拓本今存陝西省文物保管委員會。

二三、隋開皇二年（公元 582 年）《邑主雷惠祖合邑子弥姐顯明等造像記》

碑所在地不詳。此碑未見著錄，拓本今存陝西省圖書館。

二四、隋開皇四年（公元 584 年）《鉗耳神猛造像記》

碑所在地不詳。碑記和題名的一部分載入《陝西金石志》卷 7。全石拓本在陝西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和省圖書館。

二五、隋開皇六年（公元 586 年）《邑主弥姐後德合邑子卅人等造像記》，附唐乾封元年（公元 666 年）《鬲荀子合邑子廿五人改造佛像記》

碑所在地不詳。此碑未見著錄，拓本今存陝西省圖書館。

上述碑記和造像題名共二十五種。其中十三種已爲前人所著錄，但有兩種著錄不全。不見前人著錄者十二種。未著錄的部分盡可能地都抄錄一份，有兩種收入本文內，其它十種編入附錄一內。已著錄的部分，或因紀錄不全，或因釋文錯誤，其中特別是《鄧太尉祠碑》和《廣武將軍□產碑》，以其關係重要，我把兩碑的全文詳細校勘一次，加以補正，亦收入本文之內。

從時間分配和地理分佈言之，上述二十五種碑銘，屬於前秦者二，北魏者六，西魏者二，北周者十二，隋初開皇年間者三。從前秦建元三年（公元 367 年）至隋開皇六年（公元 586 年）凡二百一十九年，前後包括了六個朝代。在此二百多年內有二十五幢碑銘作為研究的資料，而且除了後秦以外，每個朝代都有一些代表性的碑銘作為研究的對象，這一點是比較令人滿意的。碑的原在地，屬於蒲城縣者三，耀州者七，白水縣者一，渭南縣（渭河北岸）者一，澄城縣者一，富平縣者一，宜君縣者一，銅川縣者一，銅川、白水二縣間者一，以上十七碑石都在渭河以北。又屬於藍田縣者一，舊咸寧縣今西安市東城東郊者二，咸陽縣者一，以上四個碑石都在渭河以南。此外，尚有四碑所在地不詳，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唐代以前關中的羌村大都在馮翊、北地二郡，換言之，即羌民的造像題名碑應在渭河以北，不在渭河以南。直至唐時，這種情況仍然照舊，只有少數的羌族官吏將士從渭北移居長安一帶。關於此點，最後一節還要提到，在此不贅。

從前秦到隋初的二百幾十年內，關中部族的分佈大致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在公元 426 年北魏佔領長安以前為前期。在前期內，關中部族以氐、羌、匈奴為主。自公元 426 年以後，拓跋鮮卑和其它北鎮雜胡相繼入關，特別是公元 528 年爾朱天光率領賀拔岳、侯莫陳悅兩軍圍鎮壓關西各族人民起義和 543 年魏孝武帝率領六坊之眾及文武官吏入關以後，關中遂成為鮮卑雜胡政治活動的集中地區。西魏和北周的兩代政權就是以徙入關中的鮮卑雜胡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此為後期。但無論如何，自東漢迄於隋唐，關中的少數部族始終是以氐、羌、匈奴為先為主出現於中國的歷史舞台的。關中之氐在西晉時即列入編戶，與西羌、匈奴直接統率於部落大人之下者有所不同。氐人和漢人的融合約在南北朝時期。北魏北周雖

亦出兵征伐氐族，但這些氐族分佈在南秦州、梁州等地，不在關中。羌族的融合比較遲些，約在中唐以後。次於氐羌者為匈奴。匈奴於漢時入關，十六國時稱“東西曹”，盤踞在貳城（黃陵縣西北）的東西。北魏滅赫連夏以後，其族更以“稽胡”之名出現於上郡一帶。直至唐代中葉始銷聲匿跡，與延河流域的漢人相互融合。北鎮鮮卑雜胡入關者多，來勢亦洶，但一至隋唐便不成其為部族集團，而僅以一種少數部族的成分出現於朝廷、戎伍、閭里之間。有些北族的士大夫如元稹、白居易之流，外人尙能指出其為某某部族的後裔，但他們自己却儼然以漢胄自居，不復承認自己的少數部族成分了。這種情況正可反映鮮卑雜胡的漢化比較更早一些。關中古代部族的始末，大致如此。

下文即圍繞着上述前後兩期關中少數部族的情況加以敘述。但如衆所知，只靠碑銘資料是很難反映出部族歷史的全貌的。即使比較簡單的部族分佈和關係，只靠碑銘也很難反映出來。因此在每節之內或多或少必須援引一些其它文獻以佐說明。下節敘述《鄧太尉祠碑》和《廣武將軍□產碑》所反映的關中部族情況。但此兩碑只能反映馮翊護軍、撫夷護軍和□產所管轄地區的部族種類、區域劃分、官吏兵士的設置等等，至於從漢到晉關中部族的由來，前後二趙與關中部族的關係，則必須事前加以說明。現在藉序言尾端，略補述苻秦建元以前關中部族的由來如下。

漢代以來，匈奴、氐、羌及其它雜胡以不同時期徙入關中。匈奴入徙有兩大波瀾：一在漢元狩三年（公元前 120 年），昆邪王殺休屠王，率衆四萬餘人降漢，武帝置五屬國以居之。此五屬國在安定、上郡、五原、天水、西河五郡的塞外。當時匈奴已遷到關中東、西、北三邊的周圍，其中上郡、安定二郡都屬於關中範圍。二在東漢建武二十六年（公元 50 年），南匈奴降漢，光武帝處之緣邊八郡，

其中朔方、西河二郡與關中密邇相接，北地郡在安定的蕭關以東，其屬關中更無疑義(注一)。西羌之入關始於東漢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當時馬援爲隴西太守，鎮壓西羌，徙置三輔，於是扶風、馮翊，遠及河東空地皆有羌族與漢民雜處(注二)。越到後來，西羌之入關者越多，除三輔外，安定、北地、上郡等地無不有羌。氐人原來分居在漢代武都郡的武都(甘肅成縣西北)、隴西郡的氐道(甘肅秦安縣西南)、天水郡的略陽(秦安縣西北)和清水(甘肅今縣)等地。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武都郡，原居武都的氐人一部分被排斥在泃水、隴山之間(在陝西隴縣西北)(注三)，此爲氐人西入關中之始。東漢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略陽興國城的氐王隨馬超起兵。後氐王從超入蜀(注四)，所遺部民數萬落，曹操徙之於扶風之美陽(陝西扶風縣北)(注五)。氐人入關中者至此益衆。到西晉前葉，關中各地的少數部族在原來的基礎上更有所擴展。郭欽上武帝書云，上郡、安定、北地、馮翊四郡都有匈奴，京兆郡有雜胡(注六)。江統的《徙戎論》謂馮翊、北地、新平、安定四郡都有羌，扶風、始平、京兆三郡都有氐(注七)。關中的少數部族既多，所以《徙戎論》云“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戎狄的人口多到與漢族的人口相等，這在當時顯然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了。部族雜居的問題，第

(注一)關中以在函谷、武關、散關、蕭關四關之中得名。蕭關在隴東鎮原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其地古屬安定郡。北地郡更在其東，治富平，今慶陽縣。

(注二)《後漢書·西羌傳》、《晉書·江統傳》。

(注三)《三國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

(注四)同上。《三國蜀志·馬超傳》注引《典略》云氐王入蜀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

(注五)《三國魏志·張既傳》云：“太祖(曹操)乃自到漢中，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其事當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注六)《晉書·北狄匈奴傳》。

(注七)《晉書·江統傳》。

一是容易產生部族衝突，第二是糧食供給不足。自曹魏以來，漢族士大夫如鄧艾、郭欽、江統之流相繼痛陳戎狄內徙之害，建議徙戎實邊之策，端由於此。但此時關中的人口稀少，縱百餘萬口尚不及漢盛時戶口的十分之一，因此在統治階級看來，若不許戎狄內徙，則不特田賦課稅無所出，即征兵徭役亦感覺萬分拮据。所以當時建議者雖憤慨陳詞，而朝廷在咸寧、太康間仍不斷允許匈奴等族入塞。這樣，關中的少數部族跟着就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了。

十六國前趙時，劉曜都長安，并州的五部屠各從此大量徙入關中。屠各一稱“休屠各”，原係匈奴休屠王及其部衆的後裔。其降衆之居五原、河西二郡者，東漢時歸南匈奴管轄，後來便成爲并州的五部屠各。其居安定、上郡、金城三郡者，則在晉初進入關中。所以在前趙時長安和渭河以北的許多郡縣成爲屠各匈奴盤據之所。劉曜又常出兵攻打上郡、隴西的氐羌和略陽仇池的氐王楊氏，氐羌附降者三萬多口，隨從他們的酋帥權渠氏、楊氏、姜氏都被徙入長安(注一)。後來劉曜在咸陽的渭城置單于台，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爲之(注二)。可知當時所謂“五胡”已經有不少麇集在關中地區了。前趙之亡，石虎雖然把秦、雍大族徙於襄國，又把關中的氐羌十五萬落徙於司、冀二州(注三)，但率領氐族東下的是前秦的始祖苻洪，擁有秦、雍氐羌十多萬戶居於枋頭；而後秦的始祖姚弋仲亦率羌族數萬人居於清河之灑頭(河北棗強縣)。當後趙末年發生了冉閔所領導的宮廷事變以後，苻洪和姚弋仲之子襄把原來率領的氐羌又遷回了關中(注四)。

(注一)《晉書·劉曜載記》。

(注二)同上。

(注三)《晉書·石勒載記》。

(注四)參考《太平御覽》卷 121 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晉書·姚弋仲載記》、《姚襄載記》及《魏書·苻健傳》等。

在前秦苻堅之時，關中除氐羌外還有不少的其它部族。《太平御覽》卷 363 引車頻《秦書》云：

“苻堅時，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爲之題目，謂胡人爲側鼻，東夷爲廣面、闊頰，北狄爲匡脚面，南蠻爲腫蹄。方，方以類名也。”

按“側鼻”即高鼻，指高鼻的西域胡。東夷廣面、闊頰，頰與額通，指夫餘等。北狄匡脚面，匡之義爲方，指屠各、鮮卑諸族。南蠻腫蹄，言其脚厚腫，指巴、蜀人等。十六國時已經置有“六夷大都督”，此所謂“六夷”，解說不一，大致和上述的部族多少總有一些聯繫。但前秦時關中的部族，除漢人外，人數最多的是氐、羌，其次就是屠各。關於氐的分佈，《晉書·苻堅載記》記述最爲詳細。《載記》云，建元十六年（公元 380 年），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願分三原、九嚙（今醴泉縣）、武都、泝（今泝陽、隴縣）、雍（今鳳翔縣南）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磐石之宗。’”從苻堅的話證明了關中的氐人居於長安的西北偏，即涇水至泝水流域的三原、涇陽、醴泉、扶風並西至泝陽、隴縣一帶，而其戶數，擬分往關東者十五萬戶，那麼原有的戶數至少當在二十萬戶以上。二十萬戶以上的氐族，每戶以五人計，即其人口當在百萬以上。這個人口數字，現在看來不算什麼，但據江統《徙戎論》云晉初關中的人口只百餘萬，而此時長安西北偏各地的氐族人口便與晉初關中全部人口相同，可知前秦時關中的氐戶是十分衆多了。當時屠各在關中的分佈，《苻堅載記》亦有記載：“興寧三年（公元 365 年），堅又改元爲建元。……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萬攻杏城（在舊鄜州中部縣西，今黃陵縣境內）已南郡縣，屯於馬蘭山（銅川縣北）。……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於長安。……轂尋

死，分其部落：貳城以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壘爲駱川侯；貳城以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從此記載知當時涇河上游至洛水上游的五百里地區駐有匈奴四萬多落，每落以五口計，共有人口二十多萬。此外，移往長安者六千餘戶，約合三萬多口。可知當時匈奴的戶口數目也是十分可觀的。羌族在關中的分佈，以前後文獻記載，應較氐及匈奴爲廣，戶口數目亦應較多，然《晉書載記》對此問題語焉不詳。且關中部族，除氐、羌、匈奴外，種類繁多。當時有哪些部族，居住何處，諸部族間的關係如何，這些問題在《晉書》和《十六國春秋》裏並不曾有所敘述。因爲如此，所以我們不得不於正史之外，求助於碑銘和造像題名這一類文獻，以期對於上述問題得到比較妥當的解決。又五胡十六國史之所以難治者，部族之外，卽爲疆域問題。清代洪亮吉著《十六國疆域志》，對此問題貢獻很大，但有些重要問題仍未徹底解決。卽以前後二秦的疆域言之，杏城、貳縣所在，諸家說法已不一致，而李潤、邢望諸堡，更難得其端倪。至在疆域之內，郡縣如何劃分，護軍如何設置，這些問題更非洪亮吉的《疆域志》所能解決的了。因爲這些緣故，我們應當利用地方碑銘，加以研究，縱然不能解決全部問題，就是從中探出一些線索，也是好的。

二 前秦《鄧太尉祠碑》和《廣武將軍□產碑》所記的關中部族

前秦留在現在的碑銘只有兩幢：一幢是建元三年（公元367年）的《鄧太尉祠碑》，又一幢是建元四年（公元368年）的《廣武將軍□產碑》。《鄧太尉祠碑》的全文前人已有著錄，但其中有些文字解釋頗有出入。今從陝西圖書館借到舊拓片一幅，又從省博物館借到一幅比較清晰的新拓片，再參考前人著錄，重為校正如下：

“大秦苻氏建元三年，歲在丁卯，馮翊護軍（注一）、建威將軍、奉車都尉、城安縣侯、華山鄭能進（注二），字宏道，聖世（注三）鎮南參軍、水衡都尉、石安令、治書侍御史、南軍督都水使者，被除為（注四）護軍。甘露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官。以北（注五）接玄朔，給兵三百人，軍府（注六）吏屬一百五十人，統和甯戎、鄜城、洛川、定陽五部領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涼西羌，盧水，白虜（注七），支胡，粟特，音水，雜戶七千，夷類（注八）十二種。兼統夏陽治。在職六載，邈（注九）無異才，履性忠孝，事上

（注一）《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衍“將軍”二字。

（注二）《八瓊室金石補正》以“進”字漫漶，解為“邈”。可備一說。

（注三）《存逸考》解“聖世”作“望出”，大誤。下文仍有“聖世”，與此同。

（注四）《存逸考》“為”誤為“右”。

（注五）《金石續編》“北”誤作“地”。

（注六）《金石續編》與《金石補正》“府”並誤作“而”。

（注七）《金石續編》《虜》誤作“盧”。

（注八）《存逸考》“類”誤作“貊”。

（注九）《金石續編》“邈”誤作“進”。“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錄”作“邈”。然字典無此字，應作“邈”。